

论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

张进, 王 焱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20世纪80年代, 伴随着“回归到物”的思潮, 物质文化研究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从消费入手, 认为大众消费是属于人类行为的小写的创造, 是当代人创造自己专属的私人生活的主要方式, 具有抵抗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消费并不一定就是有益的, 但也不应该被认为是低级的; 物质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设标准, 关照寻常物, 聚焦被忽略之物, 摒弃那种以人为主体的归类研究; 从小群体或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 考察人与物的亲密的互构关系是米勒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主旨。在米勒看来, 物质文化研究最关注的就是物是如何融入人的生活并使人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 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秩序的, 譬如数码的物质性。丹尼尔·米勒从消费的创造性、事物与人的亲密关系以及数码人类学等三个方面展开其物质文化研究, 旨在突破主客二元系统, 从人性的视角转向物性的视角, 扭转物的次级的、从属的、卑下的地位。从人类学到文化研究, 米勒的研究既体现出强烈的跨学科性, 对国内开展物质文化研究深有裨益, 但也有着理论系统性缺乏的局限。

[关键词] 丹尼尔·米勒; 物质文化研究; 消费; 数码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I 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8)02-0039-06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8.02.006

自20世纪80年代始, 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在欧美学界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热点。经过近30年的拓展和深化, 物质文化研究吸引了各相关领域的大批学者投身其中, 而身为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资深教授、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的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亦最终成为了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著作《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1987)、《舒适物》(2008)、《物品》(2009)、《消费及其后果》(2012)在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由他主编的《认知消费》(1995)、《物质文化: 为何有些事物如此重要》(1998)、《物质性》(2005)、《人类学与个体: 物质文化的视角》(2009)、《数码人类学》(2012)等一系列著述和论文集汇集了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最新且最优秀的成果。

言论转向使得文本主义占据了大半个世纪的统治地位, 至20世纪末, 随着后结构主义日渐式微, 物质文化研究将文本主义轻视或扬弃的“物”

重新拉回到人们面前。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以来现代哲学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而将物看作人的对立面, 成为人认识和宰制的对象不同, 物质文化研究试图重新考察和确立人与物的关系, 抵抗主客二元对立的范式。与言论转向以来将物视为符号、话语和意义的载体不同, 物质文化研究反对将物的研究简化为文本的、话语的研究, 旨在扭转物的从属地位。丹尼尔·米勒从大众消费的角度展开研究, 其主要的理论探讨体现在三个方面: 消费的创造性, 物品与人的亲密关系, 数码与人的关系。

一、消费的创造性

为什么要从消费入手? 米勒认为有两点主要原因, 一是当代社会的物质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复杂多样, 更重要的一点是学界长期以来对物质多样化和消费的“负面构想”。在马克思那里, 社会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系统, 消费是“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

[收稿日期] 2017-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物性诗学导论”(15FZW02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纪文论范式: 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15LZUJBWYJ007)

[第一作者简介] 张进(1966—), 男, 甘肃会宁人, 文学博士, 兰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的结束行为”。^[1] (P15) 生产和消费是辩证的、互相依存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具有同一性，亦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但马克思旨在论证生产关系，且强调生产处于决定性地位。在鲍德里亚、米勒这样的当代学者看来，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关注作为人类活动的消费，而是将消费纳入社会生产系统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证明社会生产的整体性、逻辑性，忽略了消费在社会生活、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进入 20 世纪，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一批延续了马克思传统的理论家们加入了批判现代社会大工业生产的阵营。如果说马克思对消费的态度仅仅是“不够重视”，那么卢卡奇对消费的态度就演变为负面、消极或“否定性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聚焦在人作为主体的客体化上，认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了主体意识。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2] (P144)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概念，开辟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的论域。文化工业呈现的是工具理性对人的驯化，而这种驯化是潜移默化的，通过消费标准化、同质化的大众文化商品来完成。法兰克福学派将这种超出了生存需要的消费就是异化消费的论调建立在人性、人文精神的设定上，因此马尔库塞指出现代人成为被虚假需求操控的，丧失创造性的“单面人”。到了鲍德里亚，人的主体性完全让位于客体的主体性，现代人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3] (P6) 无休止的消费成为现代人想要摆脱却无法摆脱的宿命。米勒认为，学界对大众消费的负面论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鲍德里亚对现代消费社会符号消费的分析太过精彩，以至于某种程度上成为消费研究的“真理”。以米勒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群体和个人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出发，发掘消费活动中那些被忽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米勒明确指出，自己拒绝前人“将消费缩减到商品本质、消费者缩减到得以获得商品的过程为前提的研究方法”。^[4] (P183) 相反，他的物质文化和大众消费研究更看重商品购买和分配之后的时期或“阶段”。米勒认为，看待商品不应该只关注于一般性（经济意义的购买行为），而应该聚焦于“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物品与消费者的特殊

关系中，个体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开始。米勒将这个过程称之为“重新语境化”，通过这个过程，商品与消费者开始互动，商品参与到个体消费者的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其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米勒对“重新语境化”的提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布尔迪厄经典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布尔迪厄认为“艺术和文化消费天生就倾向于，有意无意地，实现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5] (P7) 也就是说，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对自己的阶层区分进行了强化，不断指认自己的身份。但是，米勒并不认同将消费这种文化实践简化为纯粹的社会差别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文化网络中的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极为复杂。不同群体或个体的消费者都在购买行为发生后对物品进行着“创造性的使用”，相同的商品可能在多种不同的群体或多个个体那里进行了再语境化，而且这种多样性是无限制的。米勒举出欧洲工人阶级住宅内部布置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英国工人阶级的住宅虽然空间有限，但都留有一部分空间供会客之用，这个会客空间的布置集中于物品展示。在房间布置上，物品陈列与展示似乎比居住的舒适度更为重要。这“与布尔迪厄将‘真正的’工人表现为仅仅对非常直接性质、与基本需求直接相关的消费感兴趣这一点正好相反。”^[4] (P190) 米勒的这种观念暗含着意识形态操纵与抵抗的关系。

主导意识形态通过一整套文化工业操控着不同阶层的消费，产生了相对稳定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念伴随着对物质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然而对米勒来说，对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抵抗才真正值得关注。大众消费者并不单单是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者眼里的盲目的疯狂者，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再语境化的过程创造性地将一般消费品延伸至小群体的、个人化的文化构架中的“战术家”。米勒论述的消费者社会体现出消费者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与迈克尔·德塞托的“策略—战术”论不谋而合。德塞托指出“策略”（strategy）是政治、经济、科学等所依托的强力模型，也就是主导意识形态。而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绝不是甘愿受主导“策略”操控的弱者，而是擅于运用“战术”（tactic）的抵抗者。“许多日常生活实践（会话、阅读、行走、购物、烹饪等等）都具有战术特性。”^[6] 米勒认为，在我们当前的消费者社会，“商品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达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同时也变成了

人们看待、认同和理解这些价值的主要形式。”^[7] (P45) 比起劳动生产, 消费才是当代人创造自己专属的私人生活的主要方式。这种创造是小写的创造 (creativities) 而非大写的创造 (Creativity), “与科学发现, 艺术, 或社会变革这种大写的创造不同, 小写的创造是人类活动的必要特性, 因为我们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认知、身体、物质资源来应对动态的环境。”^[8] (P8)

米勒说: “长久以来, 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将消费的研究从道德审判或政治立场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而我所写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为消费的研究提供一个学术的基础, 来研究消费本身究竟是什么, 而不是我们以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的定义。”^[7] (P4) 可见, 米勒并不想为消费者社会做激烈辩护, 从而摆脱精英主义现代性传统所坚持的大众消费是文化之缺失, 人性本质之丧失的论调, 而是强调消费文化就是我们当代的文化本身, 文化是有差异性的, 但不应是等级制的。也就是说, 米勒并不主张消费就一定是有利的, 但至少不应该被认为是低级的。

二、事物的能动性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米勒深知物是人类学、考古学、博物学的传统研究对象, 那么为什么又要重新呼吁开展所谓的物质文化研究呢? 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 “回归到物” (return to things) 的思潮有直接联系。笛卡尔、康德以来建立的近现代哲学将人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成为坚不可摧的二项对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身/心、人/物、自然/文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等对立关系系统。新的物质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人与物的二元对立, 打破基于主客分裂的现代学科体系。米勒认为物质文化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他自己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和阿尔君·阿帕杜莱的《物的社会生命》, 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为代表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旨在声明事物和其他的社会组成部分一样, 都非常重要 (important)。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到新世纪, 用 matter 替换 importance 的阶段。米勒指出 “matter” 这个概念意在 “拒绝简单或直接的价值评判标准。”^[9] (P11), 利用 matter 一词的复杂含义 (作为名词既指物质实体, 又指事情; 作为不及物动词又趋向至关重要的、要紧的关系) 强调物质

文化研究将物既视为一般的, 不分等级制的物, 又视为与人、其他物息息相关的至关重要之物。借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我们可以认识到, 长久以来, 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 社会准则还是广告营销, 都在传输一套话语, 即对日常生活中和我们相关联的物的判断标准, 例如哪些物是高级的, 哪些是值得占有的。米勒认为, 这种评判的标准对物质文化研究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因此, 物质文化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设标准, 关照寻常物, 聚焦被忽略之物。

在 2005 年的长篇论文《物质性》中, 米勒称自己试图 “从两个方面对 ‘物质性’ 进行理论化: 一是一种仅仅将物作为人工制品的通俗理论; 二是完全超越主体和客体二元论的理论。”^[10] (P3) “物质” 一词的含义需要既包括通俗意义也包含哲学意义。通俗意义上的物质即人工制品, 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物质可能会涉及创造、改造、制造、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使用等等。在哲学层面上, 物质就是存在, 就是我们的文化本身, 也就是不承认有 “非物质” 的存在, 也不采取自然科学对物质的性质进行分类和描述的方法。因此, 物质文化研究者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可感知的才叫做物质, 那么暗物质这样占据宇宙总量百分之九十多的东西是什么? 难道一个坚硬的东西 (例如石头) 会比一个脆弱的东西 (例如泡沫) 更具有物质性? 虽然物质的两方面含义获得了普遍性的认可——普通的人工制品毫无疑问被当作物质, 哲学上的物质含义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 但物质文化研究还需要面对的阻力则是 “主体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subject)。“主体的暴政” 造就了米勒所说的 “事物的卑微” (the humility of things)。无论是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摆脱物质、肉身束缚, 追求精神超脱的教义, 还是人文主义传统下的现代科学理性至上, 物乃人性之对立的律条, 或是语言论中外物乃人性之表征、意义之载体的法则, 都将事物推向了人的对立面。物质文化研究所做的就是改变我们对事物 “视而不见” 的状态。米勒认为, 事实上我们越是对物质视而不见, 它们 “越是强有力地决定着场域设置和行为准则”。^[10] (P5) 米勒的这个观点在布尔迪厄、阿尔君·阿帕杜莱、布鲁诺·拉图尔那里都可以找到印证。布尔迪厄的情境化的实践理论强调人对客体物的分类、消费、使用、摆放等实践秩序对应并增强了相应的阶级、性别、身份、地位等社会秩序, 而这些实践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不容易觉察到的习惯成自然的行为。阿帕杜莱说：“我们不得不跟随着物本身，因为它们的意义就蕴涵于它们的形式、用途以及轨迹之中。只有通过对这些轨迹的分析，我们才能解释人用以激活物的存在的人的活动及其计划。由此，甚至在理论上说，是人的行为赋予物以意义，但在方法论的视域下，是运动中的物，说明了人以及社会的内涵。”^[11] (P13) 拉图尔和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中将目光投向科学实验室并聚焦于被忽略的物，从实验室的区域设置到办公物品的摆放，从仪器设备到数据记录本，无一不参与科学“事实”的建构。拉图尔扭转了科学研究是人的行为的固有观念，指出那些被忽略的物也是重要的行动元。

在《舒适物》一书中，米勒用典型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非典型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在研究开展之前米勒对结论做出两个假设：一是当代人所处的物质泛滥的社会只会让人更加肤浅，更加丧失人性本质；一是人与事物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亲密，甚至超越了人与人的关系。书中描述了位于伦敦南部的一条街上的三十个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各自通过自己的个人物品表达自己。米勒认为考察物与人的关系应该摒弃那种以人为主体的归类研究（男性/女性、亚洲人、同性恋者、工人阶级等），而是关注普通人如何与物互动，考察他们对物的购买、使用、摆放、改造；物如何表现人的思想、情感、记忆、经历；人与物如何互相成就彼此。可以看出，米勒迫切地试图突破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人被物化的异化论、文化的一切都是文本的文本主义等律令，转而强调物质文化研究的规则（discipline）就是不设规则。从小群体或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考察人与物的亲密的互构关系是米勒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主旨。米勒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不过他的“田野”不是有色人种被殖民地、少数族裔聚集地和边缘群体居住区，而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工作、休闲场所。米勒希望通过物质文化研究在人类学内部以及整个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掀起一场变革，他指出：“传统的人类学通过考察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理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成为人类。物质文化研究却旨在探寻和确认现代世界的本质是微小的事物和亲密的关系充实着普通人的生活。”^[12] (PP. 6—7) 最后，让我们回到米勒的那两个假设结论，显然他的那些从人类学角度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的研究都作为论据证明他得到的是

第二个结论。

三、数码的物质性

近几年米勒和他所在的伦敦大学学院物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数码社会，并提出了“数码人类学”这个新方向，米勒主编的《数码人类学》成为该中心的研究生教材。对数码科技的研究实质上是米勒物质文化研究的延伸。在米勒看来，数码科技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随之带来的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但学术界依然充斥着数码（和其他“泛滥的”物质一样）使人类丧失人性的论调。与之相反，在米勒和希瑟·A. 霍斯特合著的《数码人类学》导论中明确写道：“我们认为，在数码的世界里，不仅人还是人，而且，数码为人类学提供了新途径来理解人何以为人。”^[13] (P5) 一言以蔽之，物质不是给人性做减法而是做加法。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数码的定义。数码人类学给出的数码的定义是：所有由1和0的二进制发展而来，或可化约为二进制的事物。数码是以二进制为基准的事物，那么同样地可以反思人类此前建立的以十进制为基准的事物系统，这个系统最典型的部分就是货币系统。在黑格尔那里，主体经历的是“异化—复归”的过程，被简化为货币的物既是人性的威胁又帮助确保了人性。在马克思和西美尔基础上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货币化的物质世界就是对人性的威胁。同样，在数码时代我们又听到了人性受到威胁的警告，而且这一次他们声称人类面临的是技术、信息失控的局面。对此，米勒的态度是，数码化仅仅是巨大变革的开端，它提供了新的大众文化模式，延伸了物质文化的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看出，和许多反本质主义的学者一样，米勒也不认同存在“纯粹的人类”、“原本的自然”，转而强调科技和工具一样使人成为人，而不是令人恐惧之物。

米勒基于他和数码人类学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该领域的六大基本原则：一、数码本身加剧了文化的辩证属性。数码既是可化约为二进制的事物又具有无限的增值性，在这种信息增殖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也是辩证的。二、数码科技的发展丝毫没有更加中介（mediate）了人性。所谓的“前数码时代”不会比数码时代更真实更自然，数码时代的人也不会比“前数码时代”的人更丧失人性。

三、从整体上把握人性。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宗旨，虽然研究焦点可能是不同群体和个体，但人类学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全部生活经验，包括与之相关的一切因素。四、凸显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以及从全球的角度考察数码。否认数码等同于全球同质化的观点，相反认为数码推动了多元化和差异性，为边缘人群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五、数码文化存在根本的不确定性。数码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特质会引发更多的议题，不应过早下消极结论。六、数码具有物质性。物质性是现象背后的机制，数码和其他物质文化一样成为人的组成部分。^[13] (PP. 4-5)

我们重点关注数码的物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设备的物质性；语境的物质性；内容的物质性。在设备的物质性方面，米勒指出我们应该关注诸如数码垃圾这样的议题。对数码的非物质的错觉往往使我们只注意到文字、影像、声音等信息的数码化带来的物质损耗的削减，而忽略了载体的不断更新换代所导致的数量庞大的数码垃圾。在语境的物质性方面，语境“不仅指空间与时间，同时还包括了人们在使用数码科技时的不同情境与维度，这也正是物质实践的一部分。”^[13] (P37) 数码科技提供的虚拟空间并不意味着非物质空间或不存在空间，它是非实体的但却依然是物质性的。例如，基于GPS定位系统的软件重新定义了空间和距离；社交网络、个人博客不仅仅是一个沟通平台，更是重新塑造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对会客室、家的定义和认知；在《数码人类学》中巴特·拜伦芮特 (Bart Barendregt) 对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伊斯兰人口国家的社交网络的研究案例体现了非西方语境下数码化对当地人生活的重塑。在内容的物质性方面，米勒认为从根本上来讲，成为物质就是成为意义的存在。联系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语言是与社会粘连的表意符号系统，具有物质实践性，文本内容的表意行为“既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物质过程，即符号制作，又在其特有的核心性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因而从一开始它就牵涉进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和物质活动之中。”^[14] (P40) 数码世界生产、再生产的内容和其他文化文本一样指向社会性。数码科技融入日常生活的后果是我们往往无法意识到它们的物质性存在，只有当它们无法运行或满足需求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其重要性。海德格尔关于“上手物”与“在手物”的分析指出：“上手物”是使用中的物，这时我们处于人与物互动的关系中，对物本身关注最少；“在

手物”则为不可操作的对象物、客体物。与海德格尔偏向上手物不同，米勒并不在意这种区分，正是因为物无法达到人的需求的时候才更凸显其对人的作用。他强调物质性实质上是理论视角的转变，即从人性的视角转向物性的视角。

在米勒看来，物质文化研究最关注的就是物是如何融入人的生活并使人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秩序的。这也是米勒所在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建立数码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理由，数码科技融入日常生活，形成社会秩序的速度可谓惊异。与认为数码科技对人的“入侵”造成人性丧失完整性的立场不同，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认为人类的定义本身就是动态文化的秩序化过程，数码科技推动了人类走向更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我们可以从一些基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案例中得到启发。例如，在法耶·金斯伯格 (Faye Ginsburg) 对数码世界里的身心障碍人士的考察中，互联网社交媒体使自闭症人士像所谓的“正常人”一样用语言表达，在数码世界里他们成为了在现实世界里无法成为的“正常人”；虚拟软件使肢体“不健全”的人重回“健全”，在数码世界里他们可以漫步、跑跳。这些案例说明物质反而使人活得更像“人”。

结语

正如杜克大学教授约翰·威尔逊 (John Wilson) 在对《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的书评中所说：“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米勒这种对现代社会和大众消费的后果的积极性解析，但米勒的著作绝对值得阅读。”^[15] 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无论是对消费、物与人关系的讨论，还是近几年积极从事的数码人类学学科的建设都挑战了长期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的学术观念。在严肃的学术界，只要一谈到物质、消费就极易偏向对物质主义、拜物教的批判，米勒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那些极具说服力的案例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和那些我们常常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物。但由于米勒基于人类学的领域进行物质文化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尤其近十年的研究）倾向使用“参与观察法”进行案例调查和分析，欠缺理论层面的系统性。

在我国，物质文化研究才刚刚开始。虽然“物质文化”并不是一个新词，但凝结在这个词上的含义实际上局限于文物、博物研究，而这种物质文化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对，因此有必要区分

tangible/intangible culture (实体/非实体文化) 研究和 material culture (物质文化) 研究。在国内的学术语境里,“物质”、“物化”、“消费”等词一般包含负面语义,而在物质文化研究这里,这些关键词都具有中性语义,因此在国内开展物质文化研究肩负着为“物质文化”正名的使命。正如米勒在《数码人类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里提到的,相比其他国家,数码科技尤其是互联网在中国引发的变

革或许更大。显然国内的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科对这种变革的关注度远远不够,而数码科技早已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譬如网络文学、手机文学若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基于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二元模式的形式、内容研究就丧失了从物质性、社会性入手带来的可能性,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给我们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 [1] [德]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导言 [M]. 徐坚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2] [匈]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M]. 杜章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3] [法]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 全志钢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4] [英] 丹尼尔·米勒. 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 [M]. 费文明, 朱晓宁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 [5]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 [6]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xix.
- [7] [英] 丹尼尔·米勒. 消费: 疯狂还是理智——读懂人类消费的隐秘心理 [M]. 张松萍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 [8] Beth Preston. A Philosophy of Material Culture [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3.
- [9] Daniel Miller. Why Some Things Matter [A]. Daniel Miller ed. Material Culture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C]. London: UCL Press, 1998.
- [10] Daniel Miller. Materiality [A]. Daniel Miller ed. Materiality [C].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1] 阿尔君·阿帕杜莱. 商品与价值的政治 [A]. 孟悦, 罗钢主编. 物质文化读本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2] Daniel Miller. The Comfort of Thing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 [13] [英] 丹尼尔·米勒, [澳] 希瑟·A. 霍斯特. 数码人类学 [M]. 王心远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4] [英] 雷蒙德·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M]. 王尔勃, 周莉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John Wilson. Reviews [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18, 1989 (01): 113.

On Daniel Miller's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ZHANG Jin, WANG 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PRC)

[Abstract] In the 1980s, with the trend of “return to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ields. Daniel Miller carries out his studies in three aspects: creativities in consumptio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ings and people, and digital anthropology. His theories aim at breaking through dualistic system of subject/object, reversing subordinate position of the thing, and turning from humanity to materiality. From anthropology to culturre studies, Mill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re extremely helpful for domestic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Key words] 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consumption; digital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 王明丽/校对 维佳)